

以共识、共通、相容、共享 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余源培

[摘要] 创新社会管理需要理念先行,归根到底是实现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识是社会的道德基础,要使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共同价值观建设相得益彰。共通是指事关健康的人际关系,要解决“身份认定”、维护公平正义原则、抓好诚信建设。相容是指良好的社会环境,要义是“和而不同”,需要倡导辩证思维。共享突出的是分配问题,具体化为处理好“先富”、“后富”和“共富”的关系,关键是民生为本。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共识;社会共通;社会相容;社会共享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1)08-0008-05

一、创新社会管理需要理念先行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还是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但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并且表现出复杂性、尖锐性、群体性和多发性,呈现出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的特点。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既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更与我国社会处于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转型有关。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指数式的增长,使危险和潜在的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1](p.15)]对此,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虽然比较早地将过去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然而对社会建设的重视还是相对滞后的。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其间大约召开过30多次中央全会,在通过的文件和决定中,大致有15个是有关经济建设的,15个是有关党的建设的,3个是

有关政治建设的,2个是有关文化建设的。一直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才有了第一个有关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党和政府对社会管理越来越重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宏观大思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升华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有机统一的“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社会治理的大思路也从“稳定压倒一切”,提升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管理对象的认识,从传统的“单位人”,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人”。这些变化客观上都要求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建立大管理的社会模式,保持社会良好的秩序,有效地应对和规避各种社会风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归根到底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应当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被统治者;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是服务对象,不是“阿斗”,更不是“对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是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

* 本文系复旦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研究”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余源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证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促进人民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将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视为评价政绩的最高标准。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必须通过民主的、协调的方式来化解,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也不能采取主要靠“钱”摆平的办法,更不能随便使用压制手段。

诚如社会学家托夫勒所指出的,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造成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三种东西:共识、秩序和意义。由于缺乏共识,就会引起彼此关系的疏离和诚信缺失,甚至导致尔虞我诈;因为缺少秩序,社会就会无规范可循或者有规范不循,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加上意义缺乏,行动就会由于困惑、迷惘而走入歧途。针对这种情况,加强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引导公民(包括“企业公民”)有序、有控、有规范,合理合法地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便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管理创新应当落实到体制创新上,而体制创新的前提则是思想观念先行,致力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建设,这可以从抓社会共识、社会共通、社会共容和社会共享做起。

二、社会共识建设

2011年两会,“社会心态”首次写入“十二五”规划。在我国社会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体制转轨、利益转换、结构转变,必然会引发社会心态的裂变。利益分化、主体多元,在给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也造成共识难以达成,而共识的缺失就会增加分歧,继而导致新秩序建设和实施的困难,使社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出现无序状况。怎么办?人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达成社会共识则是人心稳定的保证。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人的活动总是由一定的价值追求驱使的思想支配的,这就需要在社会交往中提倡必要的共识,以便分辨什么是有意义的,是可以做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能做的,从而做到分清是非、好坏、善恶、美丑。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认同的共识,社会

利益的分化就难以得到有益的整合,就会出现相互掣肘、离心离德的混乱情况,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和解体。为此,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就曾经提醒,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要警惕“未启蒙的利己主义”,他认为,从历史上看,“道德败落在任何时候都是可悲的。我指的是使社会之为社会的那些道德共识,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样,一个新的社会要想站得住,也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基础。”^{[2](p.165)}

现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很有必要,但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实存在一个如何共识化的现实问题,即如何转化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就此而言,仅仅孤立地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还不够,同时还要抓好社会共同价值观建设,要将这两种价值观的建设相互渗透和统一起来,努力做到二者相得益彰。

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借鉴。面对多元复杂的社会结构、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对价值体系重构的呼唤、面对西方价值观的蔓延,新加坡执政者从1988年起就提出要制定出一套各民族、各宗教信仰、各社会阶层的新加坡人都能普遍接受的共同价值观。经过几年的努力,新加坡于1991年以国家白皮书的形式提出了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新加坡政府配以道德和法律两种途径,推进共同价值观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实我国在2001年9月就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五爱”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遗憾的是没有长期坚持并认真抓下去。当下我国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应当从世情和国情出发,从现实问题和需要出发,从群众的社会心态出发,提炼和制定与核心价值体系相配合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并通过公民教育和法律配合予以践行。这对于增进社会共识是十分必需的。

三、社会共通建设

如果说社会共识是社会心态建设,那么,

社会共通则是社会人际关系方面的建设。西方学者齐格蒙·鲍曼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活总体上的私人化”,是近代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在我们私人化的社会中,不满似乎指向不同的方向,甚至彼此冲突,它们极少累积并凝聚成一个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原子式的个人,彼此之间由于缺少共通,成为无家园之感的“异乡人”。^{[3](p.321)}这使得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共同体缺少认同,表面上十分频繁的社会交往却缺少诚信,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相互猜疑、争斗甚至尔虞我诈。其结果就是造成各种社会关系的紧张、凝固和封闭,以及各种矛盾的激化和难以和解。

通则顺,社会则和谐;不通则塞,社会则梗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的洛克提出“理解”的思想,休谟提出“共感”的思想;德国的康德把“善”视为“绝对命令”,反对完全功利主义的交往原则,费希特企图用“相互承认”来解决“自我”与“他我”的关系。特别是黑格尔,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在社会产生的最初时期,“自我意识就是欲望”,“自我”为了自身利益而否定“他者”的生存权。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进步中,“自我意识”逐渐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认识到“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即“通过它的对方它才是它自己”,从而认识到“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4](pp.119,122)}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经提出,要唾弃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行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行为准则,努力实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准则,用它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我国社会良好共通关系建设,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组成的共同体,它以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5](p.220)}人们在社会中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便无法进行生产和存在,所谓鲁滨逊式的人在现实中是根本没有的。马克思又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考察,在宏观上指出人类历史上呈现的人际关系中,“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形态,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继之出现的第二种形态,就是资本主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人际关系既进入普遍化联系又产生严重异化和危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是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联系,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6](p.10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p.294)}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共通感缺失的状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起码有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是每个人的“身份认定”问题。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每个“人民和民族都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8](p.6)}“人民”和“民族”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家(祖国)、对事业(振兴中华)、对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通感。这种共通又体现为政党关系的共通、民族关系的共通、阶层关系的共通、宗教关系的共通、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共通。“身份认定”是构建良性共通关系的重要前提。

第二是公平正义原则。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只有切实维护 and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让社会每一个群体的人都能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都能看到有希望的明天。这里的关键是努力改变社会结构固化的状况,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合理合法的发展空间。要缩小以资本、权力、地域、出身这些造成的“关系本位”的“世袭化”,扼制将这些“先致因素”绝对化、神圣化和扩大化的趋势,要合情合理合法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通过教育公平来发挥个人努力“后致因素”的作用,让整个社会流通起来,让“职务和地位唯才是举而向所有人开放”,“做到前途是向才能开放”。^{[9](p.61)}这是构建真正社会共同体(而非虚幻共同体)的根本要求,是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

第三是诚信建设。在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中,“诚”指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信”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倡导的都是一种待人处世的

社会美德。《中庸》将“诚”上升到哲学高度，“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其意思是指诚实无欺乃人之本性，只有诚实方能明理。至于“信”，《论语》中共出现38处，孔子把“信”作为“仁”的最重要内容，要求“敬事有信”、“谨而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当然这种诚信是有缺陷的，主要还是等级制的“人身依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不仅仅局限于熟人、地区、小团体，而且是要求覆盖整个社会；诚信首先是对宪法、法律、法规、契约的尊重、恪守和履行。人与人之间要讲诚信，相互支持，来不得虚伪；每个人取之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信誉最重要，容不得欺骗；干部身负管理国家社会之重职，理应勤政廉政，决不能贪污腐败；企业要讲社会责任，不能泯灭良心。诚信搞好了，社会才能有良性共通。

四、社会相容建设

相容作为一种社会的生态环境，指社会涵盖和协调各方面利益主体之需求的性质和能力，其要义是“和而不同”。所谓“同”即共同性、一致性；所谓“异”即差别性、多样性。“同”是相对的，“不同”是绝对的，“和”就是共荣共存，就是团结，就是联合，就是和谐，就是力量。中国优秀和合文化认为，“和为贵”，“有容乃大”，“宽以养民”，“宽以济猛”，“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唐代诗人孟郊写道：“君子山岳定，小人丝毫争。”“山岳定”就是宽大恢弘的气度，不争“私利”和“小利”。相容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由于社会分化者的利益、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多样性，社会管理者对于一些不同利益诉求、观点和意见常常是处于“未知”或“异质”状态，尤其需要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对待。诚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对被质疑的、未知的相反的诠释给予更多的宽容，更心平气和地、视阈宽广地对一些业已猜出或尚未置疑的可能加以包容。”^{[10](p.270)}相容还包括必要的“妥协”、“忍耐”和“让步”，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能使社会更加具有弹性和自我修补的能力。

相容的对立面是相互排斥。当下我国社会的不少矛盾和冲突，常常都是由于不同人群之间不能相容、和谐相处造成的。当不同地域、不

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们为生存与利益产生矛盾时，更好地兼顾各方面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变得尤为紧迫。要努力防止和克服“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情况发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之间的博弈，大致会有三种结果：或双赢；或此输彼赢；或两败俱伤，皆输。相容则和谐，排斥则俱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决策过程中的相容性，决定了其应当充分顾及各类不同人群的利益，应当为社会各利益群体提供表达意愿的制度平台，使多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需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尽可能充分地聚集到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中。要更好地运用相容途径来对利益分化的社会进行整合。

这就需要倡导辩证思维。“和”并不是没有矛盾，相反，“和”是差别、矛盾的协调，是矛盾各方面对立统一（相容）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有矛盾才有活力，关键是把矛盾处理好、转化好、解决好。因此对于各种社会矛盾不能抱以害怕、回避、否认的态度，不能绕道走。要学会换位思考，即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可能考虑到各类人群的利益，以避免决策中的失衡。决策过程中的这种换位思考，打破了人际间“我们对他们”或“他们对我们”的隔阂格局，相容到平等互利的“我们”关系之中，倾听各方面的民情、民意，集中各方面的智慧，使各种合法利益群体都有可能参与决策，再通过整合形成社会合力；也可以减少决策的偏颇和恣意性，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因此，在思维方式上应当更多地提倡求实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各级党政领导也要虚怀若谷，敢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逆耳之言，容得下尖锐的批评。

五、社会共享建设

共享体现在经济领域突出的就是分配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

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协议。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9](p.4)}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破除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告别了“贫穷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经济发展观的制约,在一段时期里,有人常常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以GDP为中心,只顾追求效率(实际上是追求经济在量上的增长),将公平置于“兼顾”位置,导致分配领域的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改革成果如何共享的问题,成为搞好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在我国,共享问题具体化为“先富”、“后富”和“共富”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基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曾多次提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11](p.155)}“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1](p.166)}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重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1](pp.373-374)}邓小平热切地希望,“在本世纪(指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1](p.374)}然而对于“共富”问题,我们解决得并不令人满意,以至于共享成为群众最大的期望,同时也成为社会管理的最大热点。

共享的关键是“民生为本”。首先,就国家与国民的分配而言,存在“民富”与“国强”的关系。管仲说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荀子批评“国富民弱”现象是“田野荒而仓廩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必定

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分配正义要求保持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步,财政收入应当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如果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比例过大,就会影响到民众的收入增加。政府应当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提高对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使其转化为人民的福利。其次,就各种财富创造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而言,存在着正确处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却得出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土地三种收入构成的片面结论。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允许并倡导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积极参与分配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不仅二次、三次分配要讲公平,一次分配也要讲公平,因为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基础性的。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就曾引用亚当·斯密如下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合人情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12]

[参考文献]

-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 汪丁丁.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M].北京:三联书店,2000.
- [3] [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 [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 [9]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0]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 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在剑桥大学的演讲[N].光明日报,2009-2-4.

责任编辑:美景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Administra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PC leadership groups in the past generations hav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n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creat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administ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cumulat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are: adherence to guidanc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cientific thoughts; overall plan and coordinated advance; 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 in reform. A few important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functions and division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optim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treamlining of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the level of decision making; adopting legal administration and building a government with laws; improving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cost; strengthening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improving achievement assessing system. (WEI Li-qun)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Guided by Consensus,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and Sharing: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needs a pioneering concept to protect people's essential interests. Consensus is the moral basis of a society, on which the core value and the common value benefit each other. Communication makes healthy personal relations, which solves identification, maintains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ccommodation means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allowing division in harmony. Sharing solves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dealing with "first wealth", "later wealth" and "common wealth" with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e priority. (YU Yuan-pei)

How Can It Be Possible for the Self-awareness, Self-confide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of Culture? : The self-awareness, self-confide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of culture is the historical task endowed by the time. To realize this historical goal, we must have three kinds of awareness: cultural mission, cultural life and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The awareness of cultural mission means we realize the historical task endowed by the time to revive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awareness of culture life is a rational belief of the revive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time of great social changes; and the awareness of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means to view cultural conflict with a strong mentality to confront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WANG Nan-shi HOU Zhen-wu)

China's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Self-awareness: to Broaden the Conception and Situation of "Chinese Urban Culture": Effective political practice relies on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 culture also need advances in the interaction. This paper means to focus on the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poses that no need to divide "urban culture" and "rural culture", but rather take city as the public forum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consciously integrating various experiences, resources and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at are easily ignored in social practice to break the narrow concept of "urban culture" and reconstruct Chinese culture with urban 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from which, the great concept and pattern of "Chinese urban cultur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will be built. (ZHANG Lian-hong)

On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generation justice is an issue that must be valued by the modern society. Due to the absence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 issue of inter-generation justice is somewhat special, different from in-generation justice. In the modern society, due to the flourish of consumerism, anthropocentrism, eco-imperialism and 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 the injustice becomes all the more obvious. Inter-generation concerns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requires us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ith man as the priority, properly deal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construct a broad plutonomy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r-generation justice. (DING Cheng-ji)

Guidelines for Doing well the Work of Masses – After Studying Hu Jintao's Speech on July 1st: In the speech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PC, the 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expounded the guideline of doing well the work of masses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reason to place so much emphasis on this is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that confront us. Hu Jintao stressed four points. First the point of view of masses was reiterated in terms of our party's nature; second, "man the first and exercising power for the people" was taken as the ultimate standard to guide, assess and